

根據日前行政院主計處公布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顯示，台灣所得最低的後五分之一家庭小孩受高等教育的比率回降至 57.7%，而且其中逾八成都是讀私立大學。反觀前五分之一高所得家庭的小孩，有 83.2% 受高等教育，而高低家庭的教育支出差距也升至 12.3 倍的歷年最高。

以上這些數據隱藏著嚴重的世代不正義。如今富有者可以一年花 30 萬元把小孩送到雙語學校就學，窮人卻連區區數百元的午餐費都繳不起。這個教育資源的差距不僅在小學、中學，也同樣出現在大學教育，這些教育資源上的差距，至終必然會推升下一代的貧富差距，而使得貧窮者陷入「貧窮循環」。

雖然今天大學、研究所畢業者的收入已不如昔日，但相較於各學歷仍高出許多。依官方去年調查，30~34 歲的青年人中，有大學以上學歷者平均月薪資仍達 4 萬元，高中職學歷者僅 2 萬 9 千元，國中學歷者 2 萬 8 千元；若以 45~49 歲的中年就業者來看，有大學學歷者平均月薪已升至 6 萬 2 千元，遙遙領先高中職學歷的 3 萬 2 千元、國中學歷的 2 萬 8 千元。這項調查顯示是否受高等教育，確實對日後的薪資水準影響甚鉅。

面對市場經濟所帶來的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政府能坐視不管，一切都交給市場決定嗎？當然不行。19 世紀後期的經濟學家馬歇爾(A. Marshall)、魏克賽爾(J.G.K. Wicksell)曾指出：「市場所產生的所得移轉，將會形成極大的不公平，任何對完全競爭的干預，把富人的所得移轉給窮人，對於經濟社會都是有利的。」這段話告訴我們，市場追求的是效率而非公平，但僅追求生產的效率而忽略所得分配的公平，非但不利於社會和諧，隨著貧富差距擴大，也將抑制消費動能而影響經濟成長，因此政府有必要採取重分配手段去修正市場的所得分配。

所謂重分配就是透過課徵累進稅、社福支出、教育支出等財政收支政策，將富人的所得移轉給窮人，藉以修正市場分配的不公，維持社會的和諧並提升消費的動能。遺憾的是，這些年包括台灣在內的多數國家皆不斷對富人減稅，

這些取巧的政策非但使得如今各國政府負債累累，也讓政府重分配功能日趨式微。近日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在全球如響斯應，即反映出小老百姓心中的怒火。

台灣的政治人物在公開演說中總會強調世代的正義，總會表示要如何扭轉當前分配不公平的局面，但用相關統計來檢驗政府的作為，卻會發現世代不正義的情況非但沒有舒緩，反而更趨嚴重。高所得家庭的孩子多數讀公立大學，而低所得家庭的孩子即使考上大學，逾八成讀的是私立大學。依教育部統計，公立大學平均一年(兩學期)的學雜費不到 6 萬元，而私立大學卻高達 11 萬元。如此讓低所得家庭負擔更沉重的學費，而讓富有家庭享受更多高等教育資源，已屬不公，而日後在職場的競爭，窮人家小孩早已輸在起跑點，貧富差距如何不繼續擴大？

或許決策當局會說，政府不是已延長助學貸款還款期限了嗎？政府不是也對於中低收入家庭的學雜費給予三成補助嗎？但這些對經濟弱勢者的協助實在是杯水車薪，仍無法讓窮人家的孩子和富人家的孩子有著立足點的平等。我們認為政府或許在其他社福的支出上可以擲節一些，但對於窮人家孩子的教育資源絕不該吝惜，以讓有心向學的孩子都能在最小財務壓力下，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我們相信，這不但符合社會正義，也是改善貧富差距的不二法則。

試想，政府是要擲節今日的教育經費而於日後多支出些社會救濟金？還是今日多編些預算讓窮人家小孩受教育，而於日後少花些救濟金？顯而易見的，把錢花在教育是上算的。這個道理至為明顯，但在政治現實下，這些長期才能見效的教育政策，往往敵不過那些短期的社福政策。如此錯謬的施政邏輯年復一年，政府社福支出的預算愈編愈多，但貧富差距反而愈來愈大，民怨也就愈積愈深。政府年年說要改善貧富差距，也經常成立專案小組，但主持大計者是否有關懷弱勢者的熱情，是否有向後看二十年的眼光，實為關鍵。否則任憑成立再多專案會報，夫復何用。

我們籲請執政當局認真看待貧窮循環的問題，這比當代貧富差距有著更深遠的影響。而解決之道非僅要修正立足點的不公平，更應給予低所得家庭足夠的高教資源，如此年復一年在經濟良性的循環下，台灣的貧富差距及財政困局，才有得到徹底改善可能。

經建會主委劉憶如日前表示，台灣長期以來只重視商品出口的思維必須改變。她認為服務的出口，特別是觀光服務的出口具有極大的產業帶動效果，包括旅館、餐飲、文創等產業都將受惠，如此非但可以創造就可觀的就業機會，也有助於改善貧富差距。

我們非常認同劉主委的看法。事實上，這些年來籲請政府改善觀光業基礎建設的呼聲從未停止，只是政府決策高層還是難以改變傳統觀念，總認為製造業、營造業才是經濟的火車頭，總認為半導體、面板等商品才是維繫出口動能的關鍵，而忽略了服務也可以出口這項事實。

商品可以出口不難理解，但是服務如何輸出？成衣、電腦、水果可以透過飛機及船舶運到國外銷售，為台灣賺取外匯，但阿里山、日月潭的美景怎麼運到國外？若不能運到國外，如何創造服務的輸出而賺取外匯？

其實，這個問題可以反過來思考。阿里山、日月潭無法運到國外，但外國人卻可以搭機來台，當他們來台灣觀光、住宿、餐飲、買茶，享受了台灣所提供的服務，這就是台灣對他們的服務輸出，服務輸出同樣也可以賺取可觀的外匯收入。

依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統計，全球服務貿易規模雖仍低於商品貿易，但去年全球的服務輸出已升至 3.7 兆美元。服務貿易內容雖有航運、旅遊、金融、專利等項目，但其中又以旅遊最受各國重視。擁有歷史文化遺產的國家如埃及、泰國、西班牙、義大利等，旅遊所獲得的收入即占服務輸出四成以上，這些無煙囪的產業為各國帶來可觀的就業機會及產值。

歐洲近年雖深陷債務危機，但絡繹於途的外來觀光客依然為他們賺進可觀的外匯。西班牙去年的觀光收入就高達 530 億美元，法國也有 462 億美元，義大利則為 388 億美元。另外，亞洲的中國旅遊收入去年高達 460 億美元，香港 221 億美元，泰國近 200 億美元，日本、新加坡及南韓也都有逾百億美元的收入；台灣則僅 86 億美元，這個收入與台灣所擁有的自然環境及歷史文化優勢，極不相稱。

今天歐洲之所以能吸引來自全球的觀光客，除了湖光山色，最重要的還是動人的歷史文化故事。19 世紀由德國一路流亡至英國的馬克思，如今他安息於倫敦海格特的墓園，每年前往參訪的旅客逾 10 萬人；後印象派畫家梵谷一生傳奇的故事深深吸引人，如今連他曾居住的法國奧薇小鎮，每年也吸引逾百萬人前去觀光；耶路撒冷有耶穌傳道的故事，每年前往朝拜者更逾 2 百萬人。此外，畢卡索位於西班牙的老家、拿破崙戰敗的滑鐵盧、愛因斯坦在伯恩的故居，也都成了觀光的地標。

不只外國如此，唐朝詩人張繼的《楓橋夜泊》也讓寒山寺馳名中外，蘇州的林園之美加上悠遠的歷史故事，每年吸引千萬以上遊客湧入。而歐陽修、蘇軾、柳永筆下的西湖，山色空濛、水光瀲灩、綠水逶迤、芳草長堤，以及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動人的歷史讓杭州每年訪客逾 3 千萬人。

當然，不是每個國家都有歷史故事。韓國不像歐洲、中國有這麼多的文人墨客，也沒有出現像馬克思這樣轉移時代的大思想家，但這些年來不斷透過韓劇創造故事，冬季戀歌、夏日香氣、大長今等風靡亞洲後，同樣帶動了韓國的觀光產業，幾年前連日本首相小泉也神往不已地詢問來訪的韓星崔智友：「冬季戀歌劇中南怡島的長椅還在否？」。由此可知，徒有美景不足以吸引觀光客，必須配合創造故事，才能繁榮一國的觀光產業。

台灣這些年在政府開放兩岸直航及大陸人民來台觀光後，觀光產業已有起色，今年不但來自大陸觀光客有成長，來自日本、韓國的觀光客也成長逾 1 成，估計全年來自全球的觀光人數將超過 600 萬人。依央行國際收支統計，今年前三季的國際旅遊收入已達 79 億美元，全年有機會超過 100 億美元，這是歷年來最好的成績。

我們認為，近年馬政府在促進觀光產業上確實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觀光產業也確實為台灣的商業及就業市場挹注了可觀的成長動能。然而以台灣豐富的歷史文化與自然景觀，實不應在亞洲四小龍敬陪末座，如今之所以落後日、韓、港、星，除了觀光基礎建設不足、許多觀光景點與周邊景觀不協調這兩項因素之外，政府從未有計畫、有步驟地藉由歷史文化故事來行銷台灣，應該是更重要的原因。

台灣近百年先後受荷蘭、西班牙、日本的統治，在全球冷戰的歲月裡，兩岸和戰更是舉世矚目的焦點，這些歷史故事、古跡文物不少，百年的滄桑足以轉化為動人的故事，而成為令人佇足的地方。政府若能有計畫地為台灣創造故事並改善基礎建設，觀光服務的輸出必將讓台灣經濟邁入一個全新的成長里程。

### 三、《社論》居高位者有責任重建台灣社會的價值觀

101.1.6

總統大選在即，近日朝野不斷在爭論老農津貼加碼是誰的功勞、股市在誰執政時表現較好，這些無謂的爭議說明政治人物的眼光何其短淺。的確，台灣社會的價值觀如今已被窄化到只剩下利益與金錢，於是研究人才留不住、大學擠不進世界百大、產業層次難以和日韓並駕齊驅，主事者千篇一律的思維就是：「再多給一些錢，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事實上，政府已編了兩階段的五年五百億特別預算，對公立大學補助已不能算少；而公立大學教授、中研院研究員的待遇，在今天台灣社會更已是人人稱羨，有多少人欲擠入此一窄門而不可得。至於政府過去二十年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對企業的減稅總額，僅近十年即逾一兆元，若加上每年超過百億的科專研發補助，政府投入的資源還能算少嗎？

由此可知，今天台灣人才外流、大學無法擠入世界百大、產業技術層次難以突破，實在不能歸責於政府提供的資源太少，而是台灣社會的價值觀出了問題。在長年選舉政治的相互攻訐下，是非對錯在台灣社會已失去一致的標準，這不僅讓人感到惶惑，也讓台灣社會的凝聚力逐漸流失。少了這個凝聚力，給再多的五年五百億、給再多的薪資補貼、給再多的研發獎勵，終非對症下藥，既增加政府財政負擔，又無益於困境的紓解。

這實實在在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一個只會追求金錢、利益的社會，是不會有作為的。十七世紀中葉出生於荷蘭的哲學家史賓諾莎(Spinoza)本可繼承龐大的遺產，但他向家人表示：「我不爭遺產，你們去分家產吧，我會磨光學鏡片，以後我靠自己勞動工作生活。」此種胸襟所成就的學問，對後世自然產生了深遠

的影響。

再看看上個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1933 年獲邀至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並非著眼於薪資，相反地，愛因斯坦提出的待遇非常客氣，使得普林斯頓當局不得不為他加薪。愛因斯坦曾敘述自己的性格：「我對社會正義及社會責任有熱烈的興趣，但對社交關係卻毫無欲求。」

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G.Perelman)因為證明了拓樸學上的「龐加萊猜想」，獲得 2006 年有數學諾貝爾獎之稱的費爾茲獎，但他並未接受；2010 年克雷數學研究所又宣布將千禧年大獎一百萬美元頒給他，佩雷爾曼依舊埋首於研究而未理睬這個獎金，他說：「證明對了，就已經夠了。」

一年多前來台訪問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他改變了世界通訊，被譽為「光纖之父」，但卻未曾把光纖技術拿去申請專利。在外人看來這是何等大的損失，但高錕卻說：「我沒有後悔，也沒有怨言，如果事事都以金錢為重，我告訴你，今天一定不會有光纖技術的成果。」

從史賓諾莎、愛因斯坦、佩雷爾曼到高錕，可以發現他們身上共有的特點，就是視金錢如浮雲，他們認真研究，不追求社交關係，但有強烈的社會正義與人道關懷，這是偉大科學家最吸引人的地方。由此可知，錢並非吸引人才、辦好大學，甚至提升研發能量的萬靈丹，相反地，一個積極的社會價值觀才是凝聚社會能量、點燃研究熱情的關鍵所在。

台灣不論藍、綠執政，都只會去關心高教經費占預算多少比例、企業研發支出占 GDP 多少比例，再以科專計畫、國發基金等政府資源去獎勵，然而卻忽略了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背後，有比金錢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社會的凝聚力、人民的價值觀。如果沒有一個積極的價值觀，大筆的預算到最後非但無法轉變成經濟發展的能量，甚至還要衍生出許多的爭議，最近台北政壇沸沸揚揚的宇昌案不就是如此嗎？

如果台灣不論朝野，居高位者的思想及道德高度都像史賓諾莎、愛因斯坦、佩雷爾曼及高錕，台灣的社會價值觀必然為之改變，風行草偃的結果，台灣還得靠不斷加薪才能留住人才嗎？還得靠政府不斷獎勵才能創造產業嗎？還得花費五年五百億才能讓大學擠進世界百大嗎？當然不必，因為這個積極的社會價值觀，

能抵得上億兆元的政府補貼。

我們並非唱高調，而是有感於這些年來經濟停滯不前、政治紛擾不斷，全是因為台灣已失去一個積極的社會價值觀。如果居高位者不思考如何有計畫地重建此一積極的社會價值觀，成天只在計算權力得失，台灣非但無法成為偉大的國家，經濟也勢將繼續停滯下去。

「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史賓諾莎、愛因斯坦、佩雷爾曼及高錕皆慨然有此一情懷，這也正是台灣應追求的社會價值觀。我們認為，政黨居高位者非僅應無愧於此一價值觀，而且更應著手為台灣社會重建此一價值觀。

#### 四、《社論》已開發國家的分野不在兩萬美元

101.1.31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估計，台灣去年的平均每人 GNP 終於升逾兩萬美元。過去十多年來，歷任總統、閣揆莫不以追求這一數字為目標，因為多數人相信跨越兩萬美元這道門檻，台灣就已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

但真是如此嗎？恐怕未必。一個國家如果只是追求每人 GNP 的提高，而忽略社會信任、文化素養、環境負荷，如此所獲得的兩萬美元亦如夢幻泡影，徒生社會亂象而已。遺憾的是，台灣這十多年來的政府施政，不是流於意識型態的爭鬥，就是流於經濟表象數字的追求，而沒有人真正去注意決定一國興衰最重要的元素，乃是社會的信任、文化的素養與環境的負荷。即使近年政府在這三方面略有作為，也都是迫於社會輿論壓力，不得不為的消極心態。如此台灣再過十年，社會價值觀與凝聚力將置於何地？而如此經濟社會還有何成長動能可言？

我們不論高深的大道理，就談談行人對斑馬線的信任與駕車者看待斑馬線的文化素養。試問今天有誰敢相信斑馬線對行人的保障？在一個沒有紅綠燈標示的斑馬線上，行人能安心地穿越馬路嗎？答案不言自明。即令總統府附近的博愛特區，有紅綠燈標示的斑馬線，依然是車不讓人，而沒有紅綠燈標示的斑馬線，更是形同虛設；黑色柏油路上那幾條白線，畫了等於沒畫，極其諷刺。

馬英九總統在台北市長任內一再強調「行人最大」，甚至曾因為行人在斑馬線上被撞死而憤怒表示：「應該狠狠地罰一次，以讓駕駛得到禮讓行人的深刻印象。」但直到如今，改善了多少？台北市無論是人行道、斑馬線、觀光景點，十日所視依舊車子最大、變電箱最大、電信箱最大，行人欲求一小小順暢的走路空間而不可得。

三年前一份針對北市學童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車輛無視兒童行於斑馬線而強行通過者，仍是北市學童最大夢魘，35%學童都曾有恐怖經驗，甚至受傷。一年多前，我國前駐南非大使陸以正在北市東區走斑馬線過馬路時，也被撞傷。若真要把全國小民百姓在斑馬線上的無奈與恐慌、悲傷與眼淚一一寫出來，已然是罄竹難書。這七、八年來，政府首長每逢斑馬線事故後的義憤填膺談話，到底落實了多少？

台灣這些年開始努力發展觀光，然而我國這種車不讓人的斑馬線文化，豈不傳為國際笑柄？行走在台灣馬路上的外國人看到此情此景，能不搖頭嗎？眾所周知，諸如美歐這些文明城市裡的汽車，只要看到行人在斑馬線上，一定會禮讓行人，這是以人為本的文化素養。政府的交通政策白皮書雖然大談「落實人本交通」的思維，但看看今日台灣的斑馬線、人行道，相關部會到底落實了什麼以人為本的作為？

我們認為台灣的基礎建設固然重要，但深植於人心的文化素養，及其所衍生的社會信任更為重要。由這七、八年來發生於斑馬線的悲傷與恐慌，證實政府並沒有把百姓們的小事當成政府的大事。政府只重視那些有形的建設，而無視於無形之公民文化素養的建立，斑馬線淪落至此，這僅僅是政府施政盲點的冰山一角。大凡無形的文化雖影響最為深遠，但除非具有遠見的政治家，是不會加以重視的，尤其在一個樣樣重視排名及量化管理的官僚體系裡，自然更難以獲得重視。然而沒有這個文化素養，沒有這個社會凝聚力，台灣終將面臨成長的極限；今日雖然升逾兩萬美元，但要達到馬總統承諾的三萬美元，恐怕是遙遙無期。

西方宗教改革之父馬丁路德曾說：「一個國家的繁榮，不取決於它國庫的殷實，不取決於它城堡的堅固，也不取決於它公共設施的華麗，而在於他的公民文化的素養。」馬丁路德一生鞠躬盡瘁於無形的信仰文化建設，而這一改革所建立的歐洲公民文化素養，推進了歐洲的文明，隨後的工業革命更讓歐洲經濟快速成長。公民文化素養之重要，於此可知。

我們建議馬總統在未來施政的「黃金十年，國家願景」裡，除了重視那些有形的基礎建設外，更須看重公民文化素養。而公民文化素養的培養，就從恢復斑馬線的尊嚴與地位開始，切莫小看斑馬線代表的意義。果能如此，台灣經濟才能突破成長的極限，進一步創造繁榮的未來。

## 五、《社論》政府官員應真誠面對統計數據

101.3.30

日前有立委在立法院院會質詢時，引述財稅資料中心的統計指出台灣二十等分位的貧富差距高達 93 倍，行政院長陳(冲)答詢時表示，全世界沒有人用報稅資料來算貧富差距的，一般都是用普查方式。財政部隨後更緊急澄清表示，財稅資料中心每年 3 月公佈的綜所稅初步統計資料，由於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家戶所得」與「課稅所得」有相當程度的落差，因此無法衡量出真正的貧富差距。財政部並強調，國際間多以「吉尼係數」等指標衡量所得差距，我國的貧富差距則是由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的家庭可支配所得來比較，以 99 年為例，五等分位的高低所得差距為 6.19 倍，低於日、美等國。

看到行政院、財政部對於貧富差距這些似是而非的回應，我們只想問一個問題，那就是政府官員們平日到底是懷著什麼心態去面對這些統計，是想瞭解貧富差距的真相，還是只想證明台灣貧富差距不嚴重？這個心態很重要。若是心繫中產家庭近年收入迅速下滑，若是憂心弱勢者難以維生，看到財稅資料中心這些數字，理應反躬自省才是，怎麼還拿得出這些理不直、氣不壯的理由夸其談？

財政部官員們應該回憶一下 99 年底赴立法院報告「改善所得分配不公，縮短貧富差距」時的情景。當時這份書面報告不也曾援引財稅資料中心的所得分配去衡量貧富差距嗎？這份資料明確地呈現五等分位稅前的所得差距，由 90 年的 10.4 倍升至 97 年的 12.2 倍，同期間稅後所得差距也由 9.5 倍增至 10.9 倍。財政部當年在報告上如此寫著：「主計處所做家庭收支調查之目的與範圍，與本部綜所稅之統計不同，惟就長期趨勢觀察，兩者資料均顯示國內家庭所得差距有逐漸擴大趨勢。」

這段話言猶在耳，沒想到如今財政部竟認為自家的統計無法衡量真正的貧

富差距，此言一出，令人錯愕。從事統計工作者都明白一件事，那就是統計是良心事業，沒有任何一份統計是全然完美的，失業統計如此，所得分配統計亦然。但只要有心瞭解，從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財政部的綜所稅資料、內政部的低收入戶統計，都可以查得一些所得分配的蛛絲馬跡，拼湊出貧富差距的真相。換言之，由不同面向來瞭解台灣的所得分配問題，才是政府今天面對貧富差距問題應有的態度，豈能因為財稅資料所呈現的二十等分位所得差距過高，就出言否定這份統計的價值。

政府官員們一直宣稱國際上都採五等分位來衡量貧富差距，但為瞭解金字塔最頂端者的收入，日本、英國、美國除了公布五等分位，也公布十等分位的所得分配情況；此外還公布前 5% 的富有家庭所得所占比例，藉以瞭解財富集中的程度。而前 5%，即二十等分位裡的最高所得家庭，也就是這次立委們質詢時所援引的比較標準。政府不對金字塔頂端的前 5% 多加探討已屬失職，還動輒拿起國際統計當擋箭牌，說什麼國際上都用「吉尼係數」、用「家庭收支調查」五等分位統計。如果真正關心貧富差距，又何需在統計上如此自我設限？

我們不擬在此對吉尼係數的算法多做陳述，大凡唸過經濟學的人都明白吉尼係數的定義。如果以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區區 1 萬 4 千多筆家庭所得資料即可算出基尼係數，那麼以 500 多萬戶的的報稅所得資料會算不出基尼係數嗎？非但算的出來，並且還可以算出稅前、稅後的基尼係數，更具參考價值。財稅資料中心的統計其有用或無用，其能否讓我們更進一步瞭解台灣貧富差距的真相，全繫於為官者的心態。

持平而論，不論用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或者財政部的綜所稅資料來估計台灣的貧富差距，都會有低估的情況，兩份資料各有不足之處。當政府官員們說綜所稅資料沒有納入社福移轉支出，會低估低所得者的收入，但高所得者在各類免稅優惠下，其報稅所得難道就不會被低估？再者，台灣目前家庭收支調查的樣本數只有 1 萬 4 千多戶，以此推計 780 多萬戶的所得，誤差豈能不大？加以如今詐騙橫行，民眾拒訪日多，受訪者恐怕也未必願意據實以告真實所得。思及此，我們還能說調查資料比稅檔資料能更正確地衡量出貧富差距嗎？

台灣今天貧富差距的問題確實愈來愈嚴重，不論是調查資料或稅檔資料，不論是五等分位或二十等分位，都同樣呈現這個趨勢。其中有些數據或許不好看，但為政者若真有心改善貧富差距，豈能對這些統計視而不見，又豈能避重

就輕只挑好的數字看？雖然此次陳內閣對貧富差距統計數字的反應，令人感到失望，但我們仍然相信陳院長確實有心改善貧富差距。惟要改善貧富差距就得有客觀的統計做基礎，如何整合財稅資料、低收入統計及家庭收支調查這三份統計，以釐清所得分配的真相，實為主管部會首要工作。

## 六、《社論》效法柴契爾夫人改革國營事業經營效率

101.4.9

最近由於政府終止油價緩漲機制，油品價格大漲一成，國營事業又成為眾矢之的。各界質疑何以虧損連連的國營事業仍可坐領高薪，為此經濟部長施顏祥決定在一週內成立「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並於六月底前提出檢討報告。

經濟部為讓各界相信政府有改革的誠意，決定延攬前中鋼董事長王鍾淦、華航董事長張家祝等企業 CEO 進入這個經營改善小組，以共同檢視台電、中油的經營效率、採購制度、人事制度及民營化進程，而各界最關心的國營事業薪資待遇、福利過優一事，也已列入人事制度這項議題。

回顧過去十年，有關公營事業效率不彰、人事成本過高雖已是老生常談，但議論者多，實行者少，只有在林信義擔任經濟部長時曾風風火火地加以檢討，他甚至要求虧損的國營企業研提「再生計畫」。這位來自民間企業的部長曾坦率直言：「長久以來，國營事業以成本加上利潤(法定盈餘)做為訂價的公式，是不對的。不論中油、台電都應該有市場導向的觀念，面對國際原油價格上揚，發電成本提高，應該先努力縮減成本，實在沒辦法，才可以將部分的成本反映在價格上。」

雖然林信義在部長任內雷厲風行，嚴控國營企業加班費，並力邀各方專家進入國營事業董事會，以強化國營事業的體質。但隨著林信義離開經濟部，這些改革理念又被束之高閣，油、電的訂價方式重新回到原點。是以近年來只要國際能源價格一漲，政府大員們總是站在台電及中油這一邊，理直氣壯地認為調漲係合情合理。

就事論事，對於政府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取消油價緩漲機制，終結一年多

來不公平的補貼，我們深表認同。但取消緩漲機制之後，該回歸什麼樣的訂價機制才合理，仍大有討論空間。由近日沸騰的民怨看來，以成本加上利潤(法定盈餘)的訂價方式已然無法為大家所接受。須知，近日群情激憤的原因還不在於油價調漲一成，而是在於中油、台電出現龐大的虧損下，依然能發放高額的年終獎金，是這個對比的畫面讓大家怒不可遏，也正是這個訂價方式引來了不平之鳴。面對外界的質疑，政府官員們千篇一律以中油、台電員工年資多數逾 25 年來解釋高薪的原因，至於在公司虧損之際何以仍能領高額年終獎金，則一概以肩負緩漲政策為託詞。言下之意，「虧損係非戰之罪，高薪則是合情合理」，惟這樣的解釋豈能令人信服？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可以發現，長期以來電力、油品這兩個行業的薪資總是高人一等。以 100 年的平均薪資(含經常性薪資、年終獎金及加班費)而言，台灣全體平均為每月 45,642 元，而電力供應業卻高達 101,051 元，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也達 93,921 元。如果只算經常性薪資，去年電力供應業每月也有 69,796 元，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62,091 元，兩者皆比全體平均 36,803 元高出甚多。

而這是否如政府官員所言，因為這兩家國營企業的員工年資較深，因此領的薪資比較高？依官方編製的 100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全台年齡在 50~54 歲的資深受僱者，經常性收入確實較高，但每月收入平均也只有 40,316 元，依然不如國營事業甚遠。換言之，把國營事業薪資偏高歸因於年資，實為避重就輕之詞。

這十年有關國營事業薪資與福利、經營效率及民營化問題，政府部門曾有不少的討論，但每每瞻前顧後，深怕引起國營事業員工反彈，於是陳年問題始終難以解決。甚至許多時候，政府調查報告也儘量迴避，不願提及國營事業薪資一事。政府官員的保守、怕事與無遠見，於此可知，非得等到民怨漫天蓋地而來，才半推半就地成立一個經營改善小組。試想，如果民怨有理，那不就證明政府平日十足的怠惰？如果民怨無理，只是因油價調漲而發發牢騷，那麼政府設這個改善小組不就顯得有些莫名其妙？然而無論是前者或後者，皆顯示出我國決策官員們圓滑有餘，勇氣不足的弱點。

1980 年代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經常被問及英國經濟的病根何在？她總是回答：「國營企業」。英國自二戰結束後，石油、鋼鐵、汽車、電信、電力、

供水、鐵路、航空，無一不是國營，柴契爾夫人在任內大力改革，引來了一波波的罷工潮。面對抗爭，她的名言是：「唐寧街十號沒有啤酒與三明治。」面對挫折，她總是說：「我身上唯一不缺的東西就是勇氣。」柴契爾夫人雖在任內被評為最不得人望的首相，但二十年後在英國每日電訊報的調查裡，她卻成為歷來最受尊敬的首相。

看看柴契爾夫人，想想我們。以國營事業的複雜度，當年的英國更甚於今日的台灣，然而她卻以無比的勇氣改造了英國。我們深切期盼馬總統、陳(冲)院長能師法柴契爾夫人，透過這個國營事業經營改善小組，不僅為台灣找出改革的方向，更凝聚出改革的勇氣。

## 七、《社論》立院及行政部門如此尊重政府統計

101.5.9

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決定將失業率、通膨率及國民所得統計等總體指標的發布時間，由下午四時變更為上午八時半。消息傳來，令各界一片錯愕，莫名其妙。

主計總處這項決定事出突然，究其原因，是因上月底主計長石素梅赴立院備詢，由於當日下午四時表訂公布經濟成長率、通膨率等最新預測，時逢油電雙漲鬧得滿城風雨，立委自然迫不及待想知道最新數據，惟石主計長堅持統計發布的程序，拒絕提前透露，此舉引起多位立委不滿，批評石素梅藐視國會，不尊重憲法。

立院隨後提案要求「主計總處依法公布各項指數當日，如遇主計長及相關同仁至立法院備詢，必須依憲法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誠實公布數據，不得拒絕。」這一提案視政府統計的獨立性如無物，令人遺憾。全世界有哪個文明的國家會允許統計數據於正式發布之前，就逕行在國會公布？發布制度果真如此隨興，政府統計制度豈非已然土崩瓦解，未來政府統計還有誰會相信？

千萬不要以為數據發布是小事。國際統計學會及聯合國統計委員會一再強調政府統計從調查、編製到發布必須有一定的章程，任意變更章程、變更

統計內涵、變動發布時間，都將大大傷害統計的公信力。也因此美、歐、日等政府統計從編製到發布，皆力求超然獨立，莫說數據不可提前在國會公布，即令總統、閣揆也不能提前知道統計的結果。

真是如此嗎？我們來看一個例子，1970年代美國勞工統計局開記者會發布失業率時，勞工部循例會派熟悉政策的官員與會。這原是好意，但1979年新任局長諾伍德(Janet Norwood)認為政府統計的獨立性不應受到政治干擾，因此通知勞工部無需派員出席記者會，她說：「在政府統計部門做事，就應該保有超然獨立的主張與堅持，即使糾正的對象是總統時，我們依然會糾正他。」諾伍德不允許政治人物干預統計的談話，雖說狂妄了點，但真要維護統計公信力，沒有如此狂狷之氣，恐怕是做不到的。

相較於諾伍德，主計長石素梅就顯得太過於溫良恭儉讓了。面對立委這一提案，石主計長理當表達政府統計的超然獨立性，無法提前透露數據的嚴正立場才是。未料，主計總處不循此途，而竟把發布時間由下午四時提前至上午八點半。如此妥協，實屬鄉愿，固然化解了主計長日後在立院的尷尬處境，但面對立委小小施壓即這般自失立場，倉卒更改發布時間，他日面對更大的政治壓力，將如何自處？政府統計的公信力豈能不令人憂心？

主計總處本可利用這次立委提案的機會，讓外界了解政府統計的超然獨立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即令辭官亦在所不惜，如此一來必將大大提升政府統計的形象。遺憾的是，主計總處還是屈服於立委的壓力，此次變更發布統計時間雖得以讓主計長脫離困境，但卻導致政府統計的獨立性再次蒙塵，是得是失，不言自明。

為讓這次變更發布時間合理化，主計總處還特別在新聞稿中提及，美國、日本、南韓也多於上午股市開盤前發布主要總體指標，意指把發布時間提前到開盤前係時勢所趨。惟不久前，石主計長在立法院堅不透露數據時還義正詞嚴地表示，主計總處之所以訂在下午四時發布數據，就是為避免數據的公布影響股匯市。短短數日，言詞反覆，昨是今非，實令不勝感慨。官場的無奈雖不足為外人道，但為官者的立場豈能如此左右搖擺？

長期以來，政府統計發布時間皆以力求避免衝擊股匯市為考量，近十年於股匯市交易結束後發布，不論發布的數據好壞，經一夜沉澱，自然難以激

盪股市。如今改為股市開盤前公布經濟數據，無異提供股市炒作題材。這項統計公布制度的改變雖緩解了來自立院的壓力，但卻為股市漲跌匯聚了更大的壓力。在油電雙漲、經濟停滯此一敏感時刻，選擇在股市開盤前發布數據，豈非讓股市更形雪上加霜？

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只是主計總處改變發布時間，如若經濟部、財政部、中央銀行、經建會發布的出口、訂單、工業生產、零售營收、景氣燈號及貨幣供給，也都由下午提前到股市開盤前發布，情況會如何？以此時此刻而言，勢必陷經濟於更大不確定性。試想，出口衰退的數據、景氣藍燈的數據在上午八點半公布後，股市豈有不跌之理？

我們認為政府統計的公信力得之不易，有賴立法及行政部門共同維繫。此次立委不尊重政府統計的獨立性固有可議之處，然主計總處遇事妥協、瞻前顧後、進退失據，更是讓政府統計獨立性動搖的主因。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期盼立法院與行政部門能及時修補，以免政府統計公信力流失之餘，又陷股市於動盪之中。

## 八、《社論》從歷史檢視政府因應自由化的迷思

101.6.26

這些日子府院高層及社會各界都因美牛案而關切自由化的問題。但什麼是自由化？是不是美牛進不來，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TIFA)不復談，台灣就違逆了自由化的浪潮？是不是台灣無法和美國洽談自由貿易協定(FTA)，最終就會在全球經濟活動中被邊緣化？

對於這些問題，馬英九總統於近期曾多次表示：如果美牛不過關，國際上會認為台灣說要自由化是玩假的；如果台美 TIFA 不復談，台灣將在區域整合中被邊緣化。他也曾以 20 年前台灣尋求加入世貿組織( WTO)來比喻今天台灣難以洽談 FTA 的處境說：「人家都加入，我們不加入，我們怎麼玩？」

馬總統把美牛連上 TIFA，繼而以 TIFA 連上台美 FTA，再以此連上自由化、邊緣化的論述，最終得出「美牛案不通過，台灣自由化是玩假的，台灣會被邊緣化」的結論。惟這些看似有理的推論是否屬實，顯然須以歷史經驗、多邊貿

易體系創造的環境及各國簽署 FTA 之後的近況加以檢視，才能得到比較正確的理解。

首先，美方以美牛案來推遲 TIFA 復談，值得這麼緊張嗎？只要對近 18 年來台美 TIFA 諮商略有瞭解的人都知道，美方找藉口延後開會已成慣性。例如原定於 1996 年初進行的第二次 TIFA 會議，從年初延到年底，又從年底延到隔年初；再如第四次 TIFA 會議原擬 2002 年底在華府召開，由於會前美方提出的 27 項著作權法修正清單，我方未照單全收，美方不滿，於是將會議一延再延，直到 2004 年的年底才復談，給台灣吃足了排頭。從這些歷史經驗可以明白，如今美方推遲 TIFA 復談，並不讓人意外，執政當局是該關注並妥為應對，但卻也無需惶恐到這種地步。

其次，復談 TIFA 是否一定能讓台美進入 FTA 的談判？這也可以回憶近 18 年來的談判歷史。其實我方在 1995 年首次 TIFA 會議就曾提議洽簽台美 FTA，但美方表明正忙於和美洲國家談判，還沒打算把台灣納入簽署對象；2002 年台灣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再度利用第四、五、六次 TIFA 正式會議及工作階層會議召開的機會，向美國提議洽談 FTA，但美方依然以談判人力不足為由婉拒了台灣的提議。回顧這十多年，美方以推遲 TIFA 的召開迫我修正著作權法、專利法、開放美牛，逐一實現，而反過來，台灣在 TIFA 會議一次次召開提議洽談 FTA，卻每每遭拒。如今我方無法從歷史教訓裡重新研擬談判策略，只會不斷呼應美方的說法來弱化自己的談判籌碼，再開第七次、第八次會議，又有何用？

至於「台灣沒有簽署 FTA，就會被邊緣化」，此一論述也有待商榷。事實上，世貿組織(WTO)這個多邊貿易體系自 1947 年以來透過八個回合的談判，已大幅調降關稅及開放市場，復以資訊科技協定、零對零方案、化學品一致性方案，更讓世貿組織會員國彼此享有許多零關稅待遇。統計顯示，如今美、歐、加、日、台、中等多數國家進口總額裡，已有五、六成是免關稅的。美國工業產品的名目關稅稅率僅 3.3%、歐盟 4.0%，除農產、紡織、成衣、運輸設備仍有較高的關稅，其餘關稅稅率已相當低，尤其是台灣出口最大宗的電子資訊產品，在多邊貿易體系下，絕大部分已享有零關稅的待遇。換言之，台灣今天無法與美、歐洽簽 FTA，是會在若干商品的關稅上吃些虧，但身為世貿組織的會員，台灣還不至於落到被邊緣化的地步。

在多數人的刻板印象裡，簽署愈多 FTA 的國家，出口愈有競爭力，但真是如此嗎？我們先看 1994 年生效的美、加、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十多年來這個協定確實讓墨西哥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明顯升高，但加拿大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卻由簽署前的 19.2% 一路降至去年的 14.3%。再看東協與中國大陸的自由貿易協定，自 2005 年起農工產品開始降稅，至 2010 年元旦形成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區，令人訝異的是，東協十國在大陸的市場占有率，反而由 2003 年的 11.5% 降至今年前四個月的 10.6%。而於去年七月生效的南韓與歐盟 FTA，也不如想像中的厲害，今年 3、4、5 月南韓對歐盟出口連月衰退 16% 以上，這固然是源於歐債風暴，但竟比大陸、台灣對歐出口衰退來得嚴重，頗令人意外。韓國對歐盟出口比重，更由去年上半年的 11.2%，降至今年 5 月的 9.5%。由這些例子可以明白一件事，那就是 FTA 並非提振出口的萬靈丹。

我們並非否定 FTA 的作用，只是在今天多邊與雙邊貿易體系的競合下，復以各國產業不盡相似，實在很難把一國的經濟榮枯，簡化到簽了 FTA 就能怎樣，不簽又會怎樣。執政當局必須思考，未來果真要簽，我們要簽的是一份讓台灣市場洞開，產業哀鴻遍野的 FTA，還是一份能降低自由化衝擊，又能提升出口競爭力的 FTA？若屬後者，那麼主政者就必須多多諮詢十年前我國入會 (WTO) 談判的幾位主談人，借重他們的經驗，審慎研商談判策略，如此才是善策。

## 九、《社論》位高則惜其位，惜位則偷合而不言

### —從江宜樺的重話談台灣文官體系的困境

101.6.29

舊唐書記載白居易初任左拾遺時，曾獻疏言事說：「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

白居易不僅是詩人、文學家，對官場文化也觀察入微，短短數語就道出了中唐文官體系的大問題。高階文官在惜位愛身之下，不知不覺地就只會迎合上意，照章辦事，難以講真話，久而久之，因循苟且等待退休。如此上行下效，蠅蠅苟苟，文官士氣豈能不低落？政府施政何來願景？民怨又如何不

逐年加深？

白居易所言，非僅存在於昔日官場，也存在於今日台灣的官場。日前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與各部會次長級文官座談時即講了重話，他告訴這些高階文官：「人民若沒有感受就等於沒有做，如果業績只呈現在厚厚的績效報告上，可能上級長官看到了，但人民沒有看到，等於沒有人知道政府做了什麼事。」

江副院長還觀察到，台灣當前的文官體系，愈來愈少人會去思考五年、十年之後的台灣該怎麼辦，只會窮於應付下周、下月會發生的事，甚至一些長遠的目標規劃，也經常被突發的狀況給邊緣化了。

江副院長曾出任研考會主委、內政部長等要職，對於文官體系自然是知之甚詳。然而不論高階、中階文官之所以只會順應上意，照章辦事，不敢直言，此一文化已非一朝一夕。昔日民進黨執政的八年如此，這四年來國民黨執政，亦復如此。如此而要高階文官們去思考五年、十年後的台灣願景，豈非緣木而求魚？

我們只要稍微回憶一下就可以發現，隨著政黨輪替，政府施政計畫趕不上變化，變化趕不上長官的一句話。十多年來文官們已學會明哲保身之道，加以近十年每任閣揆任期短、主張多，文官忽而要倡議「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忽而要呼應「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忽而要得規劃「大投資，大溫暖」；國民黨執政之後，時而要整合「愛台十二建設」、時而要提出「庶民經濟方案」，近兩年又得規劃「黃金十年」、「自由經濟示範區」。除此以外，紛擾不已的政府組織再造，更令數十萬文官忐忑不安，敢怒不敢言。執政當局未能善用文官的專業，只會不斷提出新名詞、新口號、下指導棋，如此文官為保全自己，自然要如白居易所言：「偷合而不言，苟容而不諫。」

回想台灣在民國 62 年 11 月行政院長蔣經國宣布「十大建設計畫」時，不論高階文官、中階文官都知道這是明確的施政目標，甚至連小學生也可朗朗上口，文官們在推動計畫的過程裡自然可以提高自己的識略及能力，不獨會做做錦繡文章而已。但是，近年來我們政府的施政藍圖，都是先有個漂亮的口號，接著再去研究該在這漂亮的口號下做什麼規劃，這與昔日十大建設規劃的用心，相去何其遠。如此施政思維久矣，文官們閱歷無數政策的起落

興衰、最終消失於無形，早已知道如何迎合上意。如此在政策推動過程中除了做做錦繡文章，根本無法再如二十多年前一樣，習得擔當、識略與對政策辯護的勇氣。

遠的不提，就以前不久執政當局所提出的「黃金十年願景」為例，黃金十年係兩年前馬總統在與蔡英文 ECFA 辯論會上提出的說法(馬總統在雙英辯論上說：我要帶領台灣找回失落八年，開展黃金十年)，隨後在經建會等單位歷經一年半的規劃下，終於把「說法」變成了「黃金十年願景」；至於目前還在研究中的「自由經濟示範區」，則是去年總統大選白熱化之際，馬總統與當時閣揆吳敦義對高雄的承諾。不可思議的是，執政者居然可以承諾一個只有名詞而沒有內容的口號，口號運用之浮濫，於此可知矣。

江副院長勉勵文官去思考台灣五年、十年後的發展是對的，但是如今執政高層給文官什麼樣的環境？三十多年前的行政院，會提出一個還不知道內容是什麼的「十大建設」嗎？遺憾的是，今天我們的府院高層經常提出一些只有名詞，卻沒有內容、沒有目標的所謂計畫。黃金十年如此，自由經濟示範區亦復如此。文官們今天之難以有識略、難以有擔當，孰令致之？

我們認為，文官體系的健全直接關乎國家的興衰。政黨會輪替，部長、院長、總統會換人，但文官體系持續存在，一切願景、政策最後仍得交由文官來執行。要讓台灣有強的競爭力，非得建立一個有生氣、有識略、敢言直諫的文官體系不可。新唐書對唐朝的覆亡如此評論：「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儒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這段話值得執政者深思。

## 十、《社論》人才培養不能急功近利

101.7.6

最近中研院院士會議再度談及台灣人才供需失衡的問題。一些院士批評國內的大學生國際觀不足、外語能力差，大學所訓練出來的人才無法為企業所用；也有院士建議應深化人文教育，以重建大學教育與人文精神。

台灣人才不足的問題，近十年來經常被拿出來討論，已屬老生常談。每

次熱烈討論後，政府總會採取一些做法以回應各界要求，但政府這些被動回應的作為始終是零零碎碎、且戰且走，從未有一套長期的人才培養方案。

舉例來說，六年前業界曾籲請政府調整大學的學程，以讓校園人才能為企業所用。政府幾經討論，設置了產業碩士專班、推出菁英留學計畫，行政院還成立了「人才引進及培訓會報」。但幾年下來，人才不足的問題依舊未獲解決。

去年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等人連署的「人才宣言」指出，政府長期把公務體制齊頭平等套在教研體系上，將使台灣難以聘到優秀人才，如今台灣已是高階人才的淨輸出國；此外政府設下的人才引進門檻，非但不利於爭取國際人才，甚至也使得來台唸大學的僑生與外籍生畢業後難以留用。對此馬總統回應表示會在政策上做一些調整。

近十年來有關人才的建言從未間斷，人才供需失衡確實是台灣今天的大問題。但細讀再三，提建言者都是從自身立場來看待人才問題，而不是從台灣長期的國力來思考人才問題。是以企業家總是從成本著眼，希望放寬外籍白領人才的門檻，而中研院、公立大學總是從待遇著眼，認為如今大陸清華、北大等名校的待遇已遠遠超過台灣，若不調高待遇，台灣將會面臨人才流失的危機。

然而，從長期國力來看人才問題，那就不能只著眼於人才引進的短期利益，而要有培養人才的長期思維。也不能只和他國研究人員比待遇的高低，而是應該找出提升研究熱情的方法。養才、攬才當然和成本、待遇有關，但執政者若僅著眼於成本、待遇，永遠培養不出一流的人才，也不可能留住一流的人才。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意指人才的培養需要有長期的眼光，政府絕不可以東聽一個建言、西聽一個建議，毫無章法的拼湊出一堆人才方案。

人才到底該怎麼培養，古今中外並沒有一定的法則。但翻閱傳記歷史可以發現，為師者的熱情是不可少的。以牛頓和愛因斯坦為例，兩人都深受他們老師的影響而啟發了研究的熱情。兩人自大學畢業之後都沒有追求高薪資待遇，但卻持續維持研究的熱情。1667年牛頓自劍橋大學畢業後留校負責輔導兩個學生的功課，年薪雖只有 200 鎊，但工作輕鬆，讓他得以創造出反射

望遠鏡，進而發現宇宙的奧秘。

愛因斯坦於 1900 年自瑞士蘇黎世聯邦技術大學畢業後，失業了兩年，1902 年才到專利局當審查員，年薪也僅 3,500 法郎。但他樂在其中，在專利局工作六年多，此一期間他發表了相對論、等效原理等三十篇重要論文。他後來回憶這段在專利局的歲月說：「我非常喜歡專利局的工作，在這裡我悟出最美妙的思想。年輕學者需要獨立思考，最好先找一份與世隔絕的工作，像專利審查員、燈塔看守人，這樣既履行了一項有益的職責，又有時間致力於發掘科學的奧秘。」

愛因斯坦於 1933 年應聘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此時他雖已享譽國際，但並不汲汲營營於自己的薪水，只提了一個數額不大的薪資，普林斯頓當局最後當然給他更高的待遇。由此可知，能否延攬到一流人才，關鍵不在薪資，而在於研究環境及攬才者的熱情。

我國的物理學家楊振寧、李政道，他們能有孜孜不倦的研究熱情，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也是深受其師吳大猷的影響。2002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田中耕一亦復如此。田中耕一 1981 年自日本東北大學畢業後直接進入島津製作所的研發部門，四年的大學教育能培養出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為師者的熱情實為關鍵所在。

十多年來台灣有太多人在談人才，政府也有太多的急就章方案，但這些方案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順遂了各方的要求，但台灣的人才問題卻日趨嚴重。政府只會不斷以量化指標評鑑大學、用量化指標決定教育資源的分配，用五年五百億擠進全球百大排行，卻從未致力於長期的人才培養計畫。政策片斷而零碎，只求近利而無遠圖，復以我們的教育制度重研究、輕教學，這樣的環境豈能培養出牛頓、愛因斯坦等一流的人才？

經濟發展需要人才，社會進步需要人才，國力的強弱也取決於人才。人才政策在施政位階上必須超越個別的經濟利益，培養人才更甚於引進人才。而要培養人才，就得喚起教育官員及為師者的熱情。看看牛頓、愛因斯坦、楊振寧、李政道、田中耕一的成長過程，決策當局理應有些啟示才是。